

生存悬置：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缺失与修复机制研究

徐 翡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4日

摘 要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群体。本研究以云南省保山市M村12~16岁初高中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剖析其“生存悬置”困境的现实图景、生成逻辑及社会联结修复路径。其“生存悬置”状态的形成，根源于人口流动与产业调整驱动的成长环境变迁、代际间成长秩序断裂引发的重构困境，以及价值认同危机与行为选择的迷茫失范的叠加。研究认为，需从强化内在发展能力、重塑亲子愈合纽带、促进同伴联结增生、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及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区多方联动的系统性治理路径，从而为完善农村留守青少年关爱服务体系、激活乡村人才振兴内生动力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生存悬置，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

Existential Suspension: A Study on Social Connectedness Deficiency and Repair Mechanism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Fei Xu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21,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Amid rapid urbanization, the large-scal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cities has generated a substantial

文章引用：徐翡. 生存悬置：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缺失与修复机制研究[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4): 1062-1070.
DOI: 10.12677/isl.2026.104125

population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focuses o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ged 12~16 attending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M Village, Baoshan City,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fieldwork and literature review, it examines the realistic manifestations, generative logic,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repair pathways of their “existential suspension” predicament. The formation of this existential suspension is rooted in the convergence of three intertwined factors: environmental changes driven by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construction dilemmas triggered by the rup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growth orders, and identity crises compounded by anomic behavioral choices. The study contends that systematic governance, involving coordinated efforts across five dimensions—strengthening intrinsic developmental capacities, reshaping parent-child bonding, fostering peer connectedness, building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and optimizing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is essential to address this issue. Such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engaging government,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can offer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for unlocking the endogenous momentum of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xistential Suspension,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Social Connectedn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更好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群体。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家庭、邻里、村落构成紧密的生活共同体，青少年在亲情陪伴、邻里互助与乡土文化浸润中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与行为准则。然而，当下农村留守青少年长期处于父母缺位的成长环境，社会联结功能持续弱化，他们陷入情感关爱缺失、家庭监管不到位、社区支持薄弱的多重困境，认同危机与行为失范由此滋生。

根据调研及既有研究，部分留守青少年因缺乏正确价值观引导与情感寄托，出现沉迷网络游戏、婚恋观早熟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学业倦怠等问题，这些现象呈现的本质是随着“生存悬置”状态的持续深化，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自我认同模糊、价值判断失准、情感归属缺失的深层危机。这种状态若得不到及时关注与有效干预，不仅会严重影响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正常成长，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农村社会治理隐患，制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本的有效培育。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持续出台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护航、家校社协同育人等系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健全农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青少年社会支持短板，为破解留守青少年成长困境提供了政策指引，也倒逼学界进一步聚焦该群体深层生存困境，探索系统化、长效化的治理路径。本研究聚焦的对象为初高中阶段(12~16岁)的农村留守青少年，这一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确立的关键期，其社会联结缺失的普遍性与紧迫性尤为突出。

综上，探究农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与社会联结缺失的表现、成因及修复机制对完善留守青少年关爱体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是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家庭分离、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亲子关系中断对青少年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球相关研究共同关注的主题。

首先，在心理健康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留守经历对单亲家庭青少年的抑郁有显著影响，家庭满意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运动频率具有调节作用[1]。农村留守青少年还面临着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如情绪忽视、社会回避和痛苦等，研究发现，童年情绪创伤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回避和痛苦，而留守经历在其中起调节作用[2]。其次，在行为问题上，网络受害、传统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关联，留守状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3]。另外，社会支持与家庭影响对留守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家庭功能与留守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关联[4]。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留守青少年”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涵盖心理、教育、法律、医疗卫生、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形成基于中国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农村留守青少年能否健康快乐地成长关系到农村的未来，也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5]。

首先，针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年来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讲，抑郁与孤独感是最突出的心理困扰，校园受欺凌、歧视知觉均会显著加剧抑郁症状，而且亲子分离年龄越小、时长越长，孤独感体验越强烈[6]。部分青少年还因隔代教育面临自我认同困境与疏离感问题[7]，若家庭经济困难则通过削弱心理韧性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8]。研究表明，父母返乡回流能有效改善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9]。其次，偏差行为始终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涵盖多种类型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呈现出“施暴者”与“受欺凌者”双重身份叠加特征，家庭监护及关怀教育的缺失，使留守青少年更容易实施欺凌行为[10]。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网络成瘾与手机依赖在农村留守青少年中成为高发问题，智能手机普及与监管缺位共同加剧了这一现象。此外，自我伤害、犯罪、越轨等极端行为也被持续关注，逐渐呈现低龄化、反复性强、犯罪动机随意、团伙性的犯罪特点[11]，研究认为家庭功能失调、社会约束弱化是核心诱因，累积生态风险的不同类别还会对偏差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12]。

最后，部分研究注意到该群体的就业保障问题，指出其在未来职业发展中面临教育水平不足、社会资源匮乏等多重障碍[13]，需要提前构建支持体系。研究还显示，该群体在性认知、性态度[14]、权益保护主体性认识[15]等方面存在误区，需要加强针对性教育与引导。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干预机制进行预防和矫正，指出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行为失范问题需从社会环境为切入点，将社会正确引导、家庭规范教育和学校正面教育结合，以教育引导为主，配合行政与法律手段，通过多渠道和多层次进行综合整治[16]。

3、文献评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研究成果已然丰硕。国外研究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获取数据，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家庭分离等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深入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家庭满意度、运动频率、童年虐待、心理韧性等因素在留守经历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关注到社会支持、家庭凝聚力、同伴压力等多种影响因素，全面展现了家庭分离对青少年行为的多面性影响。国内研究则紧密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等本土社会背景，研究涵盖了学习、心理、道德、个性、亲子关系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了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的复杂问题，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但是，研究仍存在局限，社会学领域具体针对“留守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研究却较少且时间较远，近年来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影响因素是否产生变化有待探究，未来研究应整合各学科的优势资源，

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共同解决“留守青少年”问题。

(三) 田野点概况

M村隶属于云南省保山市何元乡，位于乡政府西侧11公里处，距县城30公里，为村委会所在地。全村辖两个村民小组，有99户共462人，以汉族为主，其中包括徐、王、林、杨、沈五种姓氏，其中徐姓占大部分。M村国土面积3.4平方公里，海拔1350米，农民收入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当前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完善，发展甘蔗、烤烟规模化种植，并拓展经济林果及富硒蔬菜产业。

(四) 相关概念界定

“悬置”一词最初由胡塞尔提出，他认为在现象学中，应该不再关注客观事物的缘故，使得对一切问题的讨论返回到对意识行为本身的分析研究上面[17]，即撇开一切客观执念相信眼见为实的做法。胡塞尔告诉人们，要想真正看清问题，就需要进行悬置[18]，在我看来，这本质上这是一种认知与存在之间的搁置，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与之相近的概念还有失范和社会排斥。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19]。”这表明，失范就是社会经历快速变化的时候，所出现的道德和社会规则领域的混乱或无所适从状态。它表明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个体规范无法得到指引，从而导致越轨或者退缩。而1974年，勒内·勒努瓦首次使用“社会排斥”[20]一词，通常指代那些未被传统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被排斥在权利、资源、参与机会之外。以上三者都不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失范者感到行为无据，被排斥者感到无力参与，悬置者感到未来不可预期，但是最终都落在个体的无意义感、无方向感、无归属感上，这恰恰是留守青少年的核心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提到“生存悬置”这一分析概念，是对胡塞尔“悬置”概念的借用，它既不完全符合社会排斥，也不是单纯具有失范行为，而是留守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因传统生活支持系统崩溃，而新的稳定成长环境又未能及时建立，其生存坐标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解决的是“我在哪里、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2. “生存悬置”：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状况的现实图景

(一) 物质缺乏与关怀薄弱

在M村，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着显著的物质缺乏与关怀薄弱问题，这成为他们社会联结缺失的首要表现。许多留守青少年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外出务工，虽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难以满足孩子多样化的物质需求。16岁职校留守青少年小年，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外出务工的父亲每周仅提供100元生活费，需覆盖20元车费及日常饮食开支。因同村伙伴转走其手机里20元，小年情绪失控并扬言报警，从其与父亲通话中的委屈诉求，可看出其物质供给仅够维持基本生存，教育、应急、日常消费等需求严重匮乏。相关研究指出，留守青少年是被忽视的贫困群体，其在居住满意度、家用物品和设施的拥有率、主观幸福感、社交方面的贫困程度超过了非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父母的照料，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交受到了影响[21]。

另外，亲子之间沟通的低频化、表面化成为关怀薄弱的体现。M村留守青少年与父母通话沟通内容多集中于“是否吃饱穿暖”“学习成绩如何”等浅层问题，隔代监护的局限性进一步加剧了关怀缺失，祖辈通常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既无法提供学业辅导，也难以理解青少年的情感需求，部分祖辈将“不闯祸”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对青少年的兴趣培养、人格塑造等发展性需求基本忽视。

(二) 归属缺失与价值迷茫

归属缺失进一步导致留守青少年社会认同的丧失。家庭作为初级群体的核心凝聚力被地理距离消解，

青少年无法在亲子互动中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与情感归属，M村部分留守青少年坦言，“感觉自己像一个外人，家里的事都插不上手”，于是转而在同伴群体中寻求认同替代，但部分留守青少年因缺乏家庭约束，常常形成抱团逃课、夜不归宿的小团体，其价值判断多基于同伴认可而非社会主流规范。然而，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因人口流动而松动，M村留守青少年在邻里互助中的参与度下降，父母外出务工后通常将人情往来转嫁给邻里或兄弟帮忙完成，留守青少年很少程度到现场帮忙和送礼，因而难以在传统的婚丧嫁娶活动中建立归属感，甚至有些孩子表示“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另外，M村留守青少年的价值迷茫表现为人生规划的短期性及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父母的职业引导与人生示范，留守青少年对未来的认知多局限于“重复父辈流动路径”或“尽早就业谋生”，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逐渐弱化。部分青少年因长期缺乏正向激励与价值肯定，陷入“努力无用”的认知误区，在学业与生活中表现出应付的态度。这种归属缺失与价值迷茫的相互强化，使得他们的社会联结始终停留在生存型的低水平状态，进一步固化了“生存悬置”的处境。

(三) 情绪困扰与行为失范

情绪困扰是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断裂的直接心理反应，主要表现为孤独感、焦虑感与安全感匮乏的叠加。长期缺乏亲子陪伴导致其情感需求无法得到及时回应，面对学业压力、人际矛盾等问题时缺乏有效的情绪疏导渠道，易形成内向、敏感、易怒的性格特质。相关调查显示，父母外出务工所导致的亲子分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长期经历亲子分离的留守青少年更容易感到无力应对而产生抑郁情绪[22]。

行为失范作为情绪困扰的表现，也是社会联结弱化的结果。在缺乏家庭监管与社区约束的状态下，部分留守青少年因寻求情感慰藉或自我认同，易卷入网络沉迷、校园欺凌、早恋、甚至轻微违法等行为，M村留守青少年小雨，半夜和同伴邀约偷盗其他村寨的电动摩托车，丢失者报案后警察联系家长，家长却秉持漠视的教养态度。另外，15岁的涵涵早恋后半夜被男方接到家里居住，并拒绝接收父母的电话，其奶奶虽极力反对，但因缺乏有效约束手段而无济于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悬置状态”的消极反抗，他们通过越界行为试图获得关注、建立联结，但这种非制度化的互动方式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其与家庭、学校、社区的良性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失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心理需求，单纯的批判与惩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回归社会联结重构的核心逻辑。

3. M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的生成逻辑

(一) 人口流动与产业调整驱动的成长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不可逆的时代潮流。M村也不例外，传统农业的边际收益持续走低，形成了“农业低收入-城市高预期”的推拉机制，迫使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土离乡、抛家别子的生存策略。这种结构变迁直接重构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一方面，传统熟人社会支持网络逐渐消解。父母作为核心监护人的缺位，使得留守青少年失去了情感陪伴、行为引导和价值传递的首要载体，只能依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而祖辈因年龄、教育水平等限制，往往只能提供物质供养，难以满足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心理关怀与社会化指导。另一方面，产业调整带来了农村社会生态变迁，依靠烟草、果蔬种植难以维持生计，进一步加剧了成长环境的变化。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乡村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等资源持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学校生源萎缩、师资流失、设施陈旧，乡村文化活动匮乏，原本作为青少年社会化重要场所的家庭、学校、社区三者之间的协同机制断裂，留守青少年陷入监护与发展的双重困境。

(二) 代际对比下成长秩序断裂的重构困境

传统农村社会中，代际之间的成长秩序呈现出连续性的特征，体现为父辈的生活轨迹、价值观念、

行为规范通过家庭教养、田间劳作、社区互动等方式直接传递给子辈，子辈在模仿与实践完成社会化，形成稳定的成长模式。然而，人口流动带来的代际分离，打破了这种连续性，引发了成长秩序的断裂，而代际之间的对比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断裂带来的重构困境，M村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逐渐呈现出碎片化与多元化特征。他们既生活在保留着传统习俗的农村，又通过网络接触到全球化、市场化的现代文化，既面临着祖辈传统观念的约束，又受到城市流行文化的冲击。这种双重环境的叠加，使得留守青少年无法形成统一的成长参照系，陷入了“该向谁学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迷茫。并且，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双重疏远的代际关系，留守青少年只能在自我探索中尝试重构成长秩序。

此外，父辈通过外出务工获得了比传统农业更高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他们自身大多因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而从事体力劳动，发展空间有限。而M村留守青少年则普遍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部分甚至进入高中阶段，他们对自身发展有着更高的预期，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摆脱父辈“打工谋生”的命运。然而，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14岁的小西表示，“要是我的爸爸开学不回来送我去学校，我就不去念书了”，这种“高预期与低现实”的落差，使得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目标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通过读书进行升学然后就业的成长路径被打破，进一步陷入“生存悬置”状态。

(三) 价值认同危机与行为选择的迷茫失范

受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转型影响，传统乡土价值规范持续消解，而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塑形的关键青春期，现代价值观念又未能在其内心形成稳固认知，最终造成留守青少年价值认知模糊。

从价值认同的建构困境来看，家庭、学校、社区等传统价值传递载体的功能弱化是关键因素。父母的缺位使得传统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中断，农村学校重应试教育、轻价值观教育的倾向，使得青少年缺乏系统的价值引导。另外，因M村青少年缺乏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的机会，难以形成对乡村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留守青少年只能通过网络、同伴群体等非正规渠道获取价值信息，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同辈群体作为留守青少年日常互动最频繁的对象，其“混”的行为通过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联结机制”，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且持续的影响[23]。

然而，价值认同的危机直接引发行行为选择的迷茫与失范。留守青少年在“生存悬置”状态下，试图通过错误方式寻求身份认同、情感寄托与发展方向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悬置”的程度。

4. 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修复机制策略

(一) 强化内在发展能力

留守青少年的“生存悬置”始于自我认同的迷失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他们不属于城市，也无法扎根乡村。M村留守青少年应该形成对留守身份的正向认知，正视父母外出务工的现实，理解这是家庭责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选择，摒弃被抛弃、低人一等的负面认知，将留守转化为独立自强的成长契机。其次，M村留守青少年应该增加对农村事务的参与度，主动在邻里互助中找到自我价值，联结现实情感，摆脱沉迷虚拟世界的习惯，在乡土空间中获得认可和成就感。除此之外，长期的亲子分离与成长支持缺失，使留守青少年易产生孤独、焦虑、叛逆等负面情绪，若缺乏有效疏导，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联结的断裂。青少年应学会识别自身情绪信号，意识到孤独、焦虑等情绪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避免因情绪异常产生自我否定，鼓励其在情绪难以自我调节时，主动向教师、同辈或信任的长辈倾诉。

(二) 重塑亲子愈合纽带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首要场所，父母的缺位是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断裂的直接诱因，研究显示，经常得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更可能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保持良好的情感状态，从而发展出高自尊[24]。因此，应该推动父母从“物质供养者”向“情感陪伴者”转变，提升亲子沟通的频率与质量。一方面，父

母应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如多关注青少年的情感需求、避免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学会倾听与共情等。另一方面,鼓励父母通过视频通话、语音留言、线上互动等方式与青少年沟通交流时,不仅关注学业与生活,更要深入了解其心理状态与价值困惑,让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与牵挂。同时,倡导父母在节假日返乡时,多花时间陪伴青少年,参与其学习与生活,弥补日常陪伴的缺失。对于隔代监护家庭,帮助祖辈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与成长规律,提升监护水平,避免因“溺爱”或“无力管教”导致的监护失效。对于委托监护家庭,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对委托监护行为的监督,确保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与留守青少年互动的过程中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 促进同伴联结增生

学校是留守青少年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同伴群体是其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在青少年阶段,个体情感的依恋对象逐渐从父母转向同伴,他们渴望与同伴交往。当青少年获得同伴的接纳和认可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具有魅力的和有能力的,当被同伴拒绝和否定时,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产生无价值感[25]。于是,学校层面修复的机制应该在于营造包容、互助的校园氛围,促进留守青少年与同伴之间的良性互动,让同伴联结成为弥补家庭支持缺失的重要补充。

首先,要构建包容性同伴交往环境。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与制度规范,消除对留守青少年的歧视与偏见,营造“平等、尊重、互助”的校园氛围,鼓励非留守青少年主动关心、帮助留守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近年来校园欺凌案件的频发,尤其是留守青少年中此类突出的现象[26],建立校园欺凌防治机制,严厉打击针对留守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保障留守青少年的在校安全与身心健康。同时,合理编排班级与宿舍,为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创造更多互动机会,促进同伴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学校可尝试将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两两配对,共同完成一项学期任务,如合作种植一盆植物、共同准备一次班级活动,在协作中建立信任,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互帮互助”。其次,学校要开展定期培训,帮助教师了解留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与行为规律,时常与青少年谈心谈话,帮助留守青少年制定短期规划,明确目标并辅助其完成,了解其同伴交往情况,积极与家长沟通,及时发现并关心留守青少年学子的动态。同时,教师要注重发掘留守青少年的优点与特长,鼓励其在同伴群体中展示自我,增强自信心与吸引力,促进同伴联结的良性发展。

(四) 构建社区支持网络

农村社区是留守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社区支持功能逐步弱化。针对此情况,激活社区活力,整合社区资源,构建“邻里互助、社区共建”的支持网络,让社区成为留守青少年的第二家庭。M村可以增加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建设集文化、教育、娱乐、心理支持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为留守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基于此,M村可借鉴其他同类社区实践成果,成立妇女儿童之家,为青少年提供学习与娱乐的空间,发动社区青年工作人员或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开展课后辅导、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公益服务,弥补家庭与学校支持的不足。同时,利用社区广播、宣传栏等渠道,宣传安全知识、法律常识、心理健康等内容,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与综合素质。

另外,构建邻里互助支持体系。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在生活上为留守青少年提供帮助,日常接送上下学、照看饮食起居的同时给予情感上的陪伴与支持,塑造“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氛围,让留守青少年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五)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农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社会联结断裂的核心根源,是城乡产业发展失衡引发的持续性亲子分离,从根源上修复留守青少年断裂的社会联结,需立足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以本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抓手,破解乡村就业岗位不足、收入水平偏低的结构性困境,系统性推动外出务工人员就地就近回流,

从源头减少亲子长期分离现象。因此，应立足乡村本土资源禀赋，摒弃单一传统农耕的低效产业模式，一方面深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搭建标准化种养基地，依托“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联动模式，以甘蔗、扁豆、辣椒等种植为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乡村物流等产业链条，挖掘传统农业增值空间，创造大量本土化、适配性强的就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培育乡村新经济业态，以现有的沃柑果物种植采摘为参照，引入咖啡、牛油果、车厘子等其他经济作物种植，大力发展乡村观光、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社区或上级组织可以针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如无人机喷洒农药、线上直播、烟草科学种植等，鼓励农村留守青少年参与乡村发展进程，亦可将职业学校学习的技术运用到本土建设中，逐步成长为“乡村新农人”。从而，拓宽本土就业维度，打破乡村产业单一、就业渠道狭窄的局限，让农村劳动力无需远赴城市即可实现稳定增收、就地就业，从根本上扭转“务工必外出、顾家难增收”的被动局面。当留守青少年在乡土空间中获得认可、看到家乡的可能性，他们也可能成为愿意回到家乡的人，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人力资源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浪潮下，农村青壮年跨区域流动导致农村留守青少年原本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松散，普遍面临“生存悬置”的生存状态。长期家庭照料缺失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认知，不少孩子出现价值取向迷茫、自我认知混乱等现象，这些问题将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在社会融入、未来职业发展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的今天，人才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抓手。农村青少年作为未来乡村建设最具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群体，只有其认同危机及行为失范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才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由此可见，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未来发展，更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息息相关。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的修复绝非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区协同发力，构建全周期、多维度的支持网络。唯有引导留守青少年重新建立与自我、与他人、与乡土的紧密联结，同时从源头上减少留守群体的持续产生，才能真正化解“生存悬置”困境。

参考文献

- [1] Cen, W.-C., Liang, J., Zhang, X.-H., Yan, W.-J. and Qian, J. (2025) The Influence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Depression in Single-Parent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xercise Frequency. *Frontiers in Pediatrics*, **13**, Article ID: 1573630.
- [2] Zhang, D., Gao, N., Liu, X. and Wang, Y. (2025) Childhood Emotional Trauma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i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s Mediator and Left-Behind Experience as Moderato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Article ID: 157880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5.1578809>
- [3] Xie, H., Shlonsky, A., Jiang, Y. and Cui, K. (2024) Cyber Victimization, Tradi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 Role of Left-Behind Status among Adolescents in Rural China.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42**, 851-862. <https://doi.org/10.1007/s10560-024-01002-w>
- [4] Gao, F., Miao, M., Yao, Y., Ji, Z., Xiong, Y., Liu, Y., *et al.* (2025)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roblem Behaviors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4**, 1746-1761.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24-02981-1>
- [5] 鲁汉杰. 农村留守青少年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商, 2015(46): 109-110.
- [6] 张艺涵, 张婷, 赵景欣. 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 亲子分离年龄和分离时长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2, 38(1): 90-99.
- [7] 罗印师. 农村隔代教育留守青少年自我认同提升的个案介入: 以 W 村小 D 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22.
- [8] 徐明津, 杨新国. 农村留守青少年家庭经济困难与社会适应: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2020, 35(1): 22-28+93.

- [9] 王建英, 王婷, 程晓宇. 父母返乡回流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9): 124-144.
- [10] 王晓清. 认知行为疗法介入农村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矫正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24.
- [11] 王兰. 农村留守青少年行为失范的分析与对策[J]. 法制与社会, 2015(25): 171-172.
- [12] 汪泽明. 农村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类别及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3.
- [13] 查梦元, 徐敏丽. 农村留守青少年未来就业保障及其影响[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13): 186-189.
- [14] 李桂, 刘燕群, 扈菊英. 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性科学, 2017, 26(8): 146-150.
- [15] 王玉香. 农村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的质性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12): 63-68.
- [16] 毕德旭. 农村留守青少年行为失范的表现及对策[J]. 法制博览, 2019(7): 49-50.
- [17] 苏振甲. 理解的开端问题: 论胡塞尔现象学中“悬置”的意义[J]. 理论界, 2025(7): 58-64.
- [18]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9]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 [20] 丁开杰. “社会排斥”概念: 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J]. 晋阳学刊, 2009(1): 52-57.
- [21] 朱映雪. 被忽视的贫困群体: 农村留守青少年多维贫困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 [22] 刘媛. 亲子分离与留守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 友谊质量的作用[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2.
- [23] 赵阔, 陈俊成. “学不好”还是“不学好”: 农村留守青少年“混”的多重表现与改善路径[J]. 中国青年研究, 2026(5): 62-72+119.
- [24] Krauss, S., Orth, U. and Robins, R.W. (2020)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elf-Esteem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Age 10 to 1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 457-478.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263>
- [25] Birkeland, M.S., Breivik, K. and Wold, B. (2014) Peer Acceptance Protects global Self-Esteem from Negative Effects of Low Closeness To parent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 70-80.
- [26] 周燕. 如何预防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J]. 甘肃教育, 2020(1): 25.